

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双重审视

——晚清以降围绕胡培翬《燕寝考》论争平议

程尔奇

摘要：胡培翬所撰《燕寝考》一书，详考天子以至大夫士的燕寝古制，提出颇有创见的论点，成一家之言。在胡培翬生前与身后，围绕该书形成了一场学术论争。论争的内容主要就燕寝的形制，燕寝的房、室、户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胡培翬等人在论争中不断进行细密考证与严格论辩，引发出不同学术观点的直接交锋，使论争具有明显的学术史意义。尤其是诸家对材料的辨别和运用情况所展现出的“信”与“不信”在考据学中发挥的微妙而关键的作用，值得深思。同时，论争折射出的思想背景以及蕴含的思想诉求，又使之凸显出思想史的意义。胡培翬等人对燕寝古制下如此功夫加以考证，除学理层面的“求真”之外，背后还蕴藏着“行礼”这一相对虚指的诉求，其大旨可谓“行古礼、经今世”，而这种诉求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所期所思。此外，学者断断于古礼的考证辩难，似乎建构出一个知识的“封闭圈”，但这些学人对“行道”的强烈渴望以及“行礼”的诉求，实际上又使其内心始终保持着“开放”的状态。

关键词：《燕寝考》；论争；汉学；行礼；学术史；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15)01-0009-08

胡培翬是清晚期著名汉学家，所著《仪礼正义》向为学界所称道。其另一部著作《燕寝考》，考证亦颇详备，不仅胡氏本人甚是自得，自称所论乃“二千年来，未经人道者”，实“为千百年来说经者所未及”，引起时贤之聚讼，至胡氏身后仍不乏回响，不经意间围绕《燕寝考》形成了一场学术论争。重要的是，胡培翬等人在论争中不断进行的细密考证与严格论辩而引发的不同学术观点的直接交锋，使论争具有明显的学术史意义；同时，论争所折射出的思想背景及蕴含的思想诉求，又使之凸显出思想史的意义。因此，在详细叙述论争内容的基础上对其加以不同层面的分析，无疑是有必要的。因为究竟如何以学术史、思想史的双重视角来交叉审视清代考据汉学，正是如今进一步反思清代学术

的重要议题，而且直至目前显然仍有着颇为宽广的讨论空间。

一、知识的考掘：《燕寝考》撰写时之论争

胡培翬在1812-1813年间撰《燕寝考》一书。在著述过程中，胡氏与洪颐煊（1765-1837）、胡承珙（1776-1832）、张聪咸（1783-1814）、夏炘（1789-1871）等人互致书信，就燕寝问题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其后，包慎言（？-？）、张文虎（1808-1885）、顾观光（1799-1862）等又以书信、序跋等形式，或直接与胡氏辩论，或表达自己观点。于是，前后二十余年，以《燕寝考》为中心，形

胡培翬：《答包孟开论燕寝书》，《研六室文钞》卷5，黄智明点校、蒋秋华校订：《胡培翬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5年，第160-161页。

胡培翬：《答家墨庄论燕寝书》，《研六室文钞》卷5，《胡培翬集》，第153页。

收稿日期：2014-09-28

作者简介：程尔奇（1980-），河南临颖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晚清民国的思想与学术、近代中国文化史。

参看黄爱平：《百年来清代汉学思想性问题研究述评》，《清史研究》第4期。此外，张寿安教授致力于从清儒考证文字中“爬梳出思想”的工作，其《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代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清儒的考证经世与礼制重建》（载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十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37-244页），明确指出清儒在“礼之社会实践”与“礼制重建”方面的作为。《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一书则直接处理“18、19世纪礼学考证背后的思想与意义”。张教授把清儒礼学考证分为两部分：一是考礼，二是议礼，并展示了清儒如何揭明“礼秩先型”。

成了一场学术论争。概括起来，论争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三点：

其一，“东房西室”之争。

燕寝作为天子以至大夫、士寝兴之所，其房屋基本结构究竟如何？胡培翬认为“燕寝与正寝异制，正寝中央为室，左右为房，燕寝止有东房西室”，也就是说，燕寝的基本形制是东房西室（诸侯以下为此制，与天子有别）。但洪颐煊认为“燕寝有东西阶，又有堂下阶间，则亦当为三间屋制。中央为室，左右为房”。胡培翬回应认为，洪氏所言三间屋制，乃“属意揣，未有的证”。因为“堂下之有东西阶，非缘东西房而设。序无室无房，而亦有东西阶”，故洪颐煊“凡室有东西阶者，即有东西房”之说，与古制不合。

张聪咸认为，郑玄云天子“路寝制如明堂”，故路寝为左右房之制。他引《周礼》宫人“掌王之六寝之修”来证明小寝与路寝乃名异实同。胡培翬认为张氏之说混淆了路寝与燕寝，与郑玄原意相背。他说：“郑氏注《礼》，每云天子路寝制如明堂，有五寝。其笺《诗》则云‘天子燕寝，有左右房’。”且郑玄解路寝、小寝制度截然分明，张氏“以小寝为五室，以路寝为有左右房，显与郑背，非郑义，章章明矣”。胡培翬进而质曰：“路寝、小寝之名，经中致为分晰，安得相通？”驳斥了张聪咸路寝、小寝无别之说。

张文虎为《燕寝考》作序，称赞胡培翬“好学深思，能通古人之意”，对该书颇为褒奖。但若细读序文不难发现，其对胡氏之说并非全然赞同。如“诸侯以下燕寝东房西室”的观点，张文虎引《仪礼·公食大夫礼》“宰夫筵，出自东房”、郑《注》“天子诸侯有左右房”，认为“此非明对大夫士之

庙而言乎”？则“似郑君亦以土庙为有左右房，彼《公食大夫礼》注特偶失检耳”。他进而提出“郑盖以土庙不当有东房，故以房中之东解之。然则东房西室，郑意固兼庙、寝也明甚，如或说以东房西室专属之寝，亦有可疑者”。张氏又据《左传》昭公四年“使置馈于个而退”、《注》“个，东西箱，东西箱为左右房之制”等材料，认为“昭子之寝既有东西箱，则非东房西室可知”。可知张文虎并不以东房西室专为寝制，且诸侯燕寝亦不必为东房西室，这其实否定了胡培翬诸侯以至大夫、士之燕寝为“东房西室”定制的论点。

其二，“室户”、“房户”之争。

“燕寝之室有东向户以通房，房有南向户以达于堂，室无南向户”之说是胡培翬的重要发明，引起的争论亦最多。故关于“室户”、“房户”之争，堪称围绕《燕寝考》论争的核心问题。

洪颐煊致书胡培翬称，《士丧礼》“死于适室”，郑《注》“适室，正寝之室也。疾者，斋，故于正寝焉”，故“疾时处北墉下，正寝与燕寝，名虽不同，其为房室之制则一。……室制既同，其为户牖之法亦当同”。又《玉藻》：“君子之居，恒当户。寝，恒东首。”郑《注》：“当户，向阳。”则“此亦燕寝室户居南之证”。洪氏之结论谓：“大抵古人宫室，无论正寝燕寝，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广狭大小，或有不同，其为架数间、房室户牖门阶之法，则无不同也。”

胡培翬读信后，对洪颐煊所援引史料逐条辩驳，申说己意。洪颐煊以《玉藻》“君子之居，恒当户”句，证燕寝之室户在南。胡培翬则认为此句恰证燕寝之室，户为向东。他引《曲礼》“为人子者，居不主奥”，认为子不居奥，则父常居在奥。若居奥，必面向东房而居。故此，“奥而当户，是即室户在东之明证也”。胡氏又言：“古者，室中之位，以奥为尊，无论正寝、燕寝皆然。但正寝之室户在南，故居奥者，皆言东面而不言当户”，而“燕寝之室户在东，故居奥者，多言当户，而不言东面。”他又引《檀弓·孔子蚤作》章“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及《玉藻》“君子之居，恒当户”之言，认为此均为燕寝室南无户之证，“若以户为南向，则当户之居，必在室之东北隅，隅非室中尊位，不当为君子常居之所”。胡培翬自认其说“实本经注立论，非敢妄生臆见”，并望洪颐煊“取全文而是正之”，而不

这些论争的内容大致保存在三种史料之内：一、辩难者写给胡氏之书信。计有洪颐煊《答胡孝廉培翬书》（见洪颐煊：《筠轩文钞》卷9。该信又收于其《礼经宫室答问》书前），夏忻《与胡竹邨舍人论燕寝书》《再与胡竹邨书》（见夏忻：《景紫堂文集》卷10）；二、胡培翬答复辩难者之书信，包括《答洪筠轩论燕寝书》《答家墨庄论燕寝书》《答张阮林论燕寝书》《答包孟开论燕寝书》（见胡培翬：《研六室文钞》卷5）；三、《燕寝考》收入“指海”本时张文虎所作之《燕寝考序》（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10册），及顾观光撰《读研六室文钞书后》（见顾观光：《武陵山人杂著》），两文亦为讨论燕寝之文字。

洪颐煊：《答胡孝廉培翬书》，《筠轩文钞》卷8，北平：琉璃厂“邃雅斋丛书”本，1934年，第21页。

胡培翬：《答洪筠轩论燕寝书》，《胡培翬集》，第147页。

胡培翬：《答张阮林论燕寝书》，《胡培翬集》，第150页。

胡培翬：《答张阮林论燕寝书》，《胡培翬集》，第150-151页。

张文虎：《燕寝考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1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51-552页。

洪颐煊：《答胡孝廉培翬书》，《筠轩文钞》，第21-22页。

是“尚未览其全而先诤书争之”。

胡承珙赞成胡培翬燕寝东房西室之说，但不同意其“室中东向开户，南向无户”的观点。胡承珙据《诗经·斯干》“西南其户”，及郑《笺》中有“异于一房者之室户”之语，认为“孔《疏》所云，似于《笺》义有合”，“古人之室，必有南向之户，正寝、燕寝皆然”。胡培翬则复书反驳云，郑《笺》明言此句所指为燕寝，而孔《疏》释以正寝及庠制，已属郢书燕说。他进而指出：“孔《疏》既引《士丧礼》及《乡饮酒义》以释郑《笺》，则其于正寝、燕寝之制，尚漫无区别，未必是以《大戴礼》为本，似皆不足以申解《笺》义。”否认了孔颖达此说的合理性。至于胡承珙所言“正寝、燕寝皆室南向户”，胡培翬认为：“正寝原有南户，古人说宫室多举正寝为言。《夏小正》所云‘汉案户’自属正寝，非燕寝。唯《诗·绸缪》刺婚姻不时而云‘三星在户’，似是燕寝。然郑《笺》云‘束薪于野，乃见其在天’，则所谓在户者，仍属空说，而非必定指燕寝。”可知《诗》言亦不足为明证。至《士昏礼》云：“赞洗爵，酌于户外尊，入户西，北面奠爵，拜。”胡培翬以为，“上云尊于房户之东，则此户外尊，非房户而何户外尊？既为房户，则入户之户，当亦是房户，经何以不别云房户？”故“未可断‘户西’二字为南向之证也。”

包慎言同样不认同胡培翬“诸侯以下燕寝室无南户”之说。不特如此，包氏在承认“诸侯以下，燕寝之室有东向户以通于房”的前提下，提出“寝之有东西房者，其室亦当有东向户、西向户”之说，对胡氏形成挑战。他引《诗》“嗟我妇子，入此室处”，以为“此非燕寝之室乎”？又云：“‘室人交遍谄我’，则妇女也，而以室人名之矣。”他还认为“房为子位”，并引《少牢》《士丧礼》各经，认为“正寝之室，亦有东户”。包氏是胡培翬晚辈，其说虽为辩难，但点出正寝有东户，则契于胡氏之意。故胡培翬云：“此固培翬所求之，而唯恐教之不详，言之不尽者，尚安有议论于其间哉？虽然学问之道，不辨不明，培翬既得足下为直友，又安敢不以直待足下乎？”语甚谦逊。但胡氏引《列女传》“子在内

中”，《考工记》“室中度以几”，郑《注》“室中，四壁之内”等言，认为既然“内中即室中，子之位安见其必宜在房乎”？至于包氏所引《尔雅》《说文》《荀子》《淮南子》诸文，胡培翬以为亦皆不足为燕寝室之南有户之证。《尔雅》云：“东南隅谓之窔。”

《说文》解“窔”云：“户枢声也”。胡培翬据此云：

此无论向南开户，向东开户，其户枢皆在东南隅。荀子云：“奥窔之间，簟席之上。”杨《注》言“不出室堂之内”，此与“不出户”、“不下堂”，语意正同，不过言其近耳。“簟席之上”，亦与《坊记》言“衽席之上”同，非必指燕寝也。《尔雅》：“宫中之门谓之闾，其小者谓之闺，小闺谓之阁。”郭《注》以为宫中相通小门。士冠在庙，而冠毕适东壁，郭《注》以为出闾门。则《淮南》所云闺阁，亦非必专指燕寝也。

尽管胡培翬对包慎言所引史料做出不同的解读，但对包氏，胡培翬仍持殷殷之望，故在信中恳切地说：“正寝之制，经内尚有可考，惟燕寝少明文。足下熟于周秦两汉之书，能多搜出燕寝证据示余，幸甚幸甚！”

对古代寝制亦素有研究的夏炘，撰有《释寝》等篇，认为“诸侯路寝一，燕寝二，夫人亦路寝一，燕寝二矣。以此差之，大夫当正寝一，燕寝一，内子亦当正寝一，燕寝一”，与胡培翬提出的诸侯正寝一、燕寝三，大夫正寝一、燕寝二，观点不同。针对燕寝，夏炘特致书胡氏予以辩难。夏炘认为，胡培翬“室户”、“房户”之说，“经注皆无。所见李氏《仪礼释宫》云：‘寝庙以室为主，故室中专得户名。凡言户者，皆室户。若房户，则皆言房以别之。’……李氏此言，证之《礼经》，无不吻合。即以《昏礼》而言‘媵侍于户外，呼则闻’，此户指室户言。又云‘尊于房户之东’，则特言房以别之，若室户东向房开，房户南向堂开，是房户专得户名，而室户转不得为正户矣。遍考《礼经》门户之制，未闻有如此者。即汉以来说经之家，亦未闻有如此说者。”在夏炘看来，《礼经》之成例乃以“户”专指“室户”，至于“房户”则别言之，而胡氏以“户”通指“室户”、“房户”，与经例不合。

胡培翬：《答洪筠轩论燕寝书》，《胡培翬集》，第147-150页。

胡培翬：《答家墨庄论燕寝书》，《胡培翬集》，第153-154页。

胡培翬：《答家墨庄论燕寝书》，《胡培翬集》，第153-155页。

胡培翬：《答包孟开论燕寝书》，《胡培翬集》，第158-159页。

胡培翬：《答包孟开论燕寝书》，《胡培翬集》，第158-160页。

胡培翬：《答包孟开论燕寝书》，《胡培翬集》，第160页。
夏炘：《释寝》，《学礼管释》卷1，“景紫堂全书”本，第17页。

夏炘：《与胡竹邨论燕寝书》，《景紫堂文集》卷10，“景紫堂全书”本，第3页。

其三,“出房”、“出自房”之争。

“训诂明则义理明”是汉学家治学方法的基本门径,而“出房”、“出自房”之争很好地体现了胡培翬等人力图通过对字义的训释来寻求经旨的努力。同时,此争论对“室南向无户,有东向户通于房,房有南向户以达于堂”的观点之是非具有关键意义。

洪颐煊据《士昏礼》“主人出,妇复位”,“主人说服于房”,“妇说服于室”,“主人入亲,说妇之纓”,及郑《注》“入者,从房还入室也”,以为“此言主人食讫,从室出,复入于房,说服于房,复从房还入于室,与《特牲馈食礼》‘主妇出,反于房’,必出户然后反于房,其文法正相类”,并指出这些材料“非谓室东壁有户以通于房也”。胡承珙也说:“《仪礼》经文云:‘主人出,妇复位’,未见其必出而在房也。其下尚有彻饌一节,而后云‘主人说服于房’,既云‘于房’,则‘入房’字可省。”洪、胡二人通过对“出房”、“于房”等相关经文的讨论,认为胡培翬“室有东向户通于房”之说不能必然成立。

胡培翬则力图明辨“出房”、“出自房”之间的差别。他引《内则》“妻抱子,出自房”等材料断言道:“《仪礼》经内,凡实从房出者,皆云‘出房’,或云‘出于房’,无有云‘出自房’者。”如《士冠礼》云:“将冠者,出房。”又云:“服玄端爵韠,出房”,“服素积素韠,容,出房。”《士昏礼》云:“赞者酌醴,加角枬,面叶,出于房。”又云:“赞者酌醴,加枬,面枬,出房。”等等,皆可证之。胡培翬还认为,“其云‘自’者,如‘升自北阶’、‘升自西阶’之类,注皆训‘自’为‘由’,足见《内则》之‘出自房’,为出室由房,明矣”。他进而提出:“本在房中,即云‘出房’,本不在房中,而由于房以出,则云‘出自房’。”也就是说,若本在房中活动,然后从房中出来,此为“出房”;若本不在房中活动,而是经过房出来,此乃“出自房”。如《士冠礼》之“将冠者”,《士昏礼》之“赞者”,本在房中,故云“出房”。而“《内则》之‘妻抱子’,本在室中,而由于房以出,故云‘出自房’。《乡饮酒记》、《乡射记》之‘出自左房’、‘东房’,与《公食大夫礼》记之‘宰夫筵,出自东房’,皆为本不在房中,而饌具于房中以出,故为‘出自’之文。”

洪颐煊:《答胡孝廉培翬书》,《筠轩文钞》,第22页。

胡培翬:《答家墨庄论燕寝书》,《胡培翬集》,第154页。

胡培翬:《答家墨庄论燕寝书》,《胡培翬集》,第156-157页。

也正是“出房”、“出自房”的差别,才证明了室与房之间有户相通的可能性。

夏忻不同意胡氏“出房”在房、“出自房”非在房的观点。他说:

古者,房与室相通,而室为燕息之所,凡妇人行礼于堂,皆先俟于房中。《特牲》:“主妇纁笄宵衣,立于房中”,又云“盥于房中”,又云“主妇洗爵于房”。《少牢》:“主妇荐自东房。”《昏礼》:“女次纯衣纁袪,立于房中”。《记》又云“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房外”。《左传》:“季文子如宋致女”,“公享之,穆姜出于房,再拜”,是妇人行礼于堂,皆先俟于房之明证也。……至于不云“出房”、“自房出”,而云“出自房”,则尤古人行文通例。《少牢》“主妇自东房执一金,敦黍有盖”,不云“出东房”而云“自东房”,又《公食大夫礼》“宰夫筵出自东房”,不云“出东房”,而云“出自东房”,皆与此同一行文常例,不必自室出房始谓之“出自房”也。

在夏忻看来,“出房”、“出自房”不过古人“行文通例”,并不能据此论定“本在房中出”还是“经房而出”。

胡培翬等人纠缠于“出房”、“出自房”等文字之别,看似琐碎,实际上秉承的正是汉学一字一义,不明不已之宗旨。若从为学角度言,这种考论,对于明晰经义大旨不无裨益。尽管双方得出的见解各异,但就严格按照经注材料以立说这一点而言,则莫不相同。

二、身后之回响:晚清以降学人对燕寝的再讨论

《燕寝考》成书约36年后,胡培翬去世。其后,学界对此书的回响并未终止,黄以周、俞樾、张锡恭等人均直面其说,予以评述。而在民国以后,王国维等人虽未直接引述胡氏之说,但在有关燕寝之论述中,亦对胡氏观点有所回应。

黄以周(1828-1899)在《礼书通故》中对胡培翬之说提出质疑,他认为:

《礼经》所说,多是正寝。郑《注》每以东房西室为说,非也。惟士之正寝,以《昏》、《丧》两礼考之,郑说无西房,似为有据。凡尊设于房户间,或设于东楹西。士昏于正寝,且设尊在房户之东,为无西房也。《丧大记》主

夏忻:《与胡竹邨论燕寝书》,《景紫堂文集》卷10,第7-8页。

人括发于东房，妇人髻，带麻于西房；而《士丧礼》妇人髻于室，为无西房也。《丧大记》“君称言，视祝而踊”，祝相君之礼，须相向立。《士丧礼》“君升自阼阶，西向，祝负墉南面”，时立于房户东。向君，为无西房也。胡氏谓士之正寝有东西房，似失察。

黄以周据《礼经》考证郑玄之说，首先驳斥了胡培翬正寝为左右房之制的论点，认为正寝应有东房，但并无西房；胡氏谓士之正寝有东西房，似失察”。

接着，针对胡氏燕寝“室无南向户”之说，黄以周从《礼经》通例的角度出发，加以辨正。他说：

胡说东房西室之制，房与室有户以相通，近是。云室无南户，寝非正寝，皆误。《昏礼》所言多女家事，期昏以下乃及壻家，故郑明之曰“寝，壻之室”，非谓燕寝。凡《礼经》称户，皆是室户，房户则言房以别之，如此经“尊于房户之东”是也。余言户皆室户，不得谓无南户。

黄氏之说与胡氏可谓大异。黄以周虽以胡培翬所言“房与室有户以相通，近是”，但两者根本不同。黄氏以为昏礼在正寝，胡氏则力证昏礼在燕寝。故接下来所证房、室、户等，自不相同。更具分歧性的是，黄氏认为《礼经》但凡提及户，皆为室户，若言房户，当必加房字以示区别（与夏斂同）。黄以周精研三《礼》，往往站在礼学的总体角度看待问题，故其说对胡氏所论无疑会产生一定的冲击。

俞樾（1821-1907）也对胡氏观点提出批评。他在回复戴望（1837-1873）讨论《仪礼》相关问题的信札中说：

胡氏《燕寝考》，仆处有之。然谓燕寝东房西室，室东壁有户以达于房，其南面有牖无户，此实大不然者。果如其说，则由堂入室，必先由房矣。以《左氏传》所载东郭姜事观之，是时公拊楹而歌，则在堂可知也。姜与公始皆在堂，欲出避之，若房有户，而室无户，则姜入房中，便当自北堂而出矣，何必入室，多此转折乎？胡氏所说，殊不足据。洪氏颐煊《宫室答问》一卷，亦深以胡说为非。然而所说，必牵合《考工记》明堂之数以定丈尺，亦未免过泥。且改古人五架之屋为七架之屋，亦无据据。

在此，俞樾对胡培翬和洪颐煊之间的论争做出了评论。他称胡培翬“燕寝东房西室，东壁有户以达于房，其南面有牖无户”之说“实大不然”。俞氏举《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齐庄公调戏东郭姜，姜避之入室之例，认为“姜与公始皆在堂”，若堂与室无户，则姜入房中，“当自北堂而出”即可躲避，“何必入室，多此转折乎？”在俞樾看来，姜“入于室”，正说明堂与室有户相通，否则由堂入房，不从北堂避出，反而又从房入室，实于理不合，故“殊不足据”。洪颐煊“深以胡说为非”，合于俞樾意，但过泥古人，擅改古制，“亦无据据”。

在对胡、洪二人之说进行驳论后，俞樾向戴望推荐说：“足下若欲治《仪礼》，孔氏巽轩有《庙寝异制图》。其‘寝制’一图，姑且勿论，其‘庙制’一图，可据以治《礼》矣。且其所说亦颇简明。”他还表示，“仆治《礼》竟，亦当为《宫室考》一卷”。

可知俞氏对《仪礼》宫室之事，也感到深研之必要。且驳胡扬孔，颇有高下之分。

黄以周、俞樾二人是胡培翬的批评者，但张锡恭（1858-1924）之论议则与胡氏相接近。张氏为黄以周弟子，亦以精研三礼著称于世，著有《丧服郑氏学》《礼学大义》等。其《茹茶轩文集》中有读胡培翬《仪礼正义》笔记三则，对胡氏治礼潜心于宫室表示赞赏，认为“其订注诸条，以订房室之说为最详”。其最末一则专说胡氏《燕寝考》及与诸贤论辨之事，指出其“著为《燕寝考》，而又与洪筠轩、胡墨庄诸君，贻书辩难。盖自喜发千古未发之覆，于《正义》中亦屡言之”。认为“胡氏之论正寝、燕寝，虽未尽合于郑君，而为生平所独得”，应当为学人所重视。就具体观点而言，从张锡恭《士庙东房西室考》一文可知其与胡氏可谓大同小异。如他说：

天子宗庙、路寝制如明堂，燕寝左右房。

诸侯宗庙、路寝左右房，燕寝东房西室。大夫宗庙左右房，正寝、燕寝皆东房西室。士宗庙、正寝、燕寝皆东房西室。其差次亦秩然不紊也。

张锡恭认同庙、寝随秩次等差而应当有别，且接受

黄以周：《礼书通故》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5-36页。

黄以周：《礼书通故》第1册，第36页。

俞樾：《又与子高》，《春在堂尺牍》卷1，“春在堂全书”

本，第13-14页。

俞樾：《又与子高》，《春在堂尺牍》卷1，第14页。

张锡恭：《读胡氏礼经正义三》，《茹茶轩文集》卷9，刻本，1923年，第25页。

张锡恭：《读胡氏礼经正义三》，《茹茶轩文集》卷9，第26页。

张锡恭：《士庙东房西室考》，《茹茶轩文集》卷9，第2页。

了胡培翬自诸侯以至大夫士，燕寝之制皆为东房西室的结论。但张氏与胡培翬的看法也并非全然一致，如他认为随秩次变化，自诸侯以下，宗庙与正寝之制均次第降差，这就与胡培翬自诸侯以下正寝基本保持左右房之制不变的观点不同。简言之，二者所同者为燕寝，所异者在正寝。

除上述直接回应胡培翬之学人外，还应提及王国维与沈文倬二先生。王国维（1877-1927）《明堂庙寝通考》长文，亦有论燕寝之专节，虽未辨胡氏之说，但提出了自己看法。他说：

至于四屋相对，则为一切宫室之通制。……

至燕寝四屋相对，则有可言者焉。古之燕寝，有东宫，有西宫，有南宫，有北宫。其南宫之室谓之适室，士以下无正寝，即以燕寝之南宫为正寝。北宫之室谓之下室，东西宫之室则谓之侧室。四宫相背于外，四室相对于内，与明堂、宗庙同制。其所异者，唯无太室耳。

王国维认为，燕寝和正寝等一切宫室形制一样，均为“四屋相对”。这里所言四屋，是从寝数上讲，且王氏并未区分天子以至大夫士之间寝数的差别。总结其说，要点有三：其一，燕寝有四；其二，四燕寝为相对之制，南谓适室，北谓下室，东西谓之侧室；其三，士以下无正寝，以适室为正寝。

王国维学问渊深，但其论燕寝之说，颇有可疑处。其谓燕寝皆四屋相对之制，与正寝同，这便与古代宫室制度昭隆杀、示等差不相符合。此外，王氏作此文时是否读过胡培翬《燕寝考》也是一个问题。刘盼遂（1896-1966）撰有《观堂学礼记》，是其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听王国维《仪礼》课程时之笔记。其中讲至《士昏礼》时，有“酌于户外尊”条，刘氏记曰：“师云：宜从戴东原衍户字。”然下有“媵侍于户外”条，刘氏记曰：“师云：‘户’疑为东墉通房之户，非南面向堂之户也。”此说与胡培翬“室有东向户以通房”之说十分相近，但王氏对胡氏却只字未提。不知是否此时王国维不曾见到胡氏《燕寝考》，或王氏暗从其说而未明言，或并不赞同胡氏之说，抑或刘氏漏记，均难查知。

沈文倬曾点校胡培翬《仪礼正义》，对胡氏观点当谙熟于心，且他早就感到胡培翬《仪礼正义》“虽颇精审，但存在问题也很多”，故提出相左之说，

应有所据。其《周代宫室考述》一文详细考察周代士、卿大夫、诸侯、天子等不同爵位者宫室情况。论及燕寝时，沈氏认为，“只要肯定因爵位不同，正寝之外，燕寝是有多有少的”，并进而指出“天子五寝，诸侯三寝，卿大夫一寝，士则无燕寝而有下室，这一说法近得乎正”，此与胡氏“士有燕寝”的观点相异，且在燕寝数目上，也与胡培翬所言大夫“燕寝二”不同。

三、双重审视：对围绕《燕寝考》形成论争之分析

综观围绕胡培翬《燕寝考》形成的学术论争，有两个层面的内容值得分析与思考。第一个层面，是与论争直接相关的内容；第二个层面，是如此细密论争形成之缘由，及论争背后所蕴含的思想实质。

就第一个层面而言，有两点堪值一说：

其一，胡氏燕寝为“东房西室”之说，基本上得到了学界认同。夏炘称“郑氏复起，不易斯言”，顾观光亦以为“以东房西室为燕寝之制，自不可易”。但“室南向无户，东向开户以通房，房南向开户以达于堂”的观点，时贤多有异议，争言极多。事实上，胡培翬之论断常有不安处，且因为尊郑玄太过，使其立说的可信度有所降低。

其二，在材料的辨别和使用方面，诸家相异之处值得深思。如胡培翬每引《尚书大传》“古者，后夫人将侍于君前，熄烛后，举烛至于房中，释朝服，袭燕服，然后入御于君。鸡鸣，太师奏鸡鸣于阶下，夫人鸣佩玉于房中，告去也”以证其说，即遭到夏

沈先生曾有全面订补、甚至改编胡培翬《仪礼正义》之意，故他反复考究胡氏写作目的和写作条例，认为胡氏“撰《丧》、《祭》诸篇写定最早，精密可与焦氏、孙氏比美；《冠》、《相见》、《聘》、《觐》诸篇，乃其病中赶写，往往自乱其例，颇多疏漏。至于其弟子杨大培所宣扬‘补辑五篇十二卷’，其实全属胡氏早年辑录引文，校理修饰犹未妥贴”。沈先生《周代宫室考述》一文虽引胡氏之说，却并未言及《燕寝考》。详见沈文倬：《学术自传（片段）》，收氏著：《蓊闇文存》下册附录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029页。

详沈文倬：《周代宫室考述》，《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按，《中国教育报》2011年10月23日文史版曾刊登本节的小部分内容，但删改颇多，行文、材料亦有不同，特此说明。

夏炘：《与胡竹邨论燕寝书》，《景紫堂文集》卷10，第2页。

顾观光：《读研六室文钞书后》，《武陵山人杂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2页。

详拙文：《胡培翬〈燕寝考〉考论》，《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年第2期。

王国维：《明堂庙寝通考》，《观堂集林》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8页。

详刘盼遂著、聂石樵辑校：《刘盼遂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10-311页。

析的质疑。夏氏以为,“《尚书大传》虽古书,而此节颇不可信”。他还说:“《大传》云‘释朝服,袭燕服’,岂后御王,未熄烛之先,犹服展衣,既熄烛之后,始服褕衣,夫人御君,未熄烛之前,犹服褕衣,既熄烛之后,始服私服乎?何与《礼经》之不合也?且妇人无说服于房之礼,《士昏礼》‘主人说服于房’、‘妇说服于室’。盖室者,燕息之地也,男子之服尊,故说于房中,妇人之服褻,故说于室中。《大传》后夫人说服于房,于经无所见。《周礼》太师、小师诸职,亦无‘奏鸡鸣’之文。燕寝褻地,鸡鸣之时,即令太师奏阶下,于情亦为不合”。既然于经文、情理均有不合之处,《尚书大传》的这段话就需要仔细推敲了。故此,夏旸告诫胡培翬,对材料之取舍当审慎:“大抵此等古书有合于经者,取之,否则,阙疑可也。”同样引用《尚书大传》这段材料,胡培翬力图证明室有东向户以通房,而夏旸则认为这条材料本身便“颇不可信”,所云“夫人御君,未熄烛之前,犹服褕衣”,实“与《礼经》之不合”。运用相同材料,却有如此相异的认知与理解,可知“信”与“不信”在考据学中着实发挥着微妙而关键的作用。

就第二个层面而言,燕寝问题之所以能引起当时如此众多学人之兴趣,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胡培翬所处之徽地,甚重礼学研究。江永(1681-1762)撰《礼书纲目》,程瑶田(1725-1814)著《仪礼丧服文足徵记》《考工创物小记》,金榜(1735-1801)有《礼笺》,凌廷堪(1755-1809)著《礼经释例》等。这种礼学研究的风气,促使学人对于礼制颇有讨论之热情。第二,向来古宫室研究中重点多在正寝,如北宋陈祥道(1053-1093)《礼书》、南宋李如圭(1167-?)《仪礼释宫》等,探讨燕寝者相对较少。清儒在此方面有所进展,如江永《仪礼释宫增注》等。但整体情况仍如胡培翬所言:“前人论宫室者,详于正寝,而燕寝恒略。”胡培翬能总结前贤,发明古制,予以专题论述,势必会引起当时治礼学者的兴趣。

更重要的是,胡培翬等人就燕寝等古代礼制进行如此细密的考证与论辩,更多的有其背后隐藏的关怀。因为胡培翬等人下如此功夫进行考辩,绝非纯粹以“知识”的追求为目标。诚然,他们在丰富材料之间寻找关联,竭力还原古制真貌,是一种“考礼”的诉求。但诸家就同一问题反复论辩时,时常

折射出的是他们力图通过“考礼”、“议礼”来实现“行礼”这一相对虚指的思想诉求。

所谓“行礼”,即复古礼以行于今日之意。从内在理路来讲,“行礼”这一诉求并非自胡培翬这代学人所始。清初毛奇龄在自叙学礼历程时就提出“说礼者,行礼者也”的看法。其后,治礼经颇有心得的程瑶田更把行礼与“为仁”等同起来。他说:

为仁之实,在己之“动容周旋中礼而已”。故视、听、言、动,已也。苟其非礼,则随在皆有害于吾之为仁,“复礼”者,去其非礼,而一一皆有以中乎礼,是礼也,天秩有之,所谓“受天地之中以生”,而具于吾心以为吾之性,圣人因其性中天秩之所有者制为礼,以待其人而行。能行其礼,斯之谓为仁。

在程瑶田看来,圣贤制礼,为后人留下规矩,只有能行其礼,才可谓“为仁”。这就把“行礼”提高到儒者之立命这一层面上来。

“以礼代理”思想的代表人物凌廷堪重视礼学,其论“复礼”颇详,强调“行礼”更甚。凌氏说:

若舍礼而别求所谓道者,则杳渺而不可凭矣。而君子之行礼也,本之知、仁、勇,三者皆为斯人所同得,故曰德者得也,天下之达德是也。若舍礼而别求所谓德者,则虚悬而无所薄矣。盖道无迹也,必缘礼而著见,而制礼者以之;德无象也,必藉礼为依归,而行礼者以之。

凌廷堪所言之“行礼者”,盖泛指依循圣人所制之礼而行事之人,其深研礼制的目的,除了考求制礼者的本意以外,如何行礼为其重点关注。

不过,凌廷堪等人所热衷的“行礼”在同时代即遭到不解,甚至其师翁方纲亦认为:

古人制礼,原是为资于一时之用,而非欲供后人考,今读者则只宜考其同异,而不当复泥其当日之所用。如吾门人凌仲子撰《仪礼释例》,吾久笑其迂。此等撰述,意欲何为,有此光阴,又不如考定同异矣。……考证为最要,考证即义理之学,不分二事。

翁方纲治学在“汉宋之间”,如此评议并无恶意,但

夏旸:《与胡竹邨论燕寝书》,《景紫堂文集》,卷10,第8-9页。

胡培翬:《燕寝考·卷首》,《胡培翬集》,第313页。

毛奇龄:《丧礼吾说篇》卷1,刻本,1770年,第2页。

程瑶田:《通艺录·论学小记》,《程瑶田全集》,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59-60页。

凌廷堪:《复礼中》,《校礼堂文集》卷4,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0页。

翁方纲:《致朝鲜金正喜书》,见张伯伟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49页。

他认定“考礼”才是最为要者，既然考证古礼足以探赜义理，那么复古礼以行于今日则完全没有必要。

尽管遭到一些学人的批评与质疑，清代以来的儒者对“行礼”有着持续的诉求却是不争的事实。作为徽儒后进，又曾及凌廷堪之门，胡培翬的思想必然受到程、凌等人的影响。所以他研究礼经，不仅研究古制本身，对于如何行礼，也颇措意。他在写给别人的信中说：“宫室制度，非讲明有素，则读《仪礼》时，先于行礼方位盲然，安问其他？”从中可见其留存古制之冀望及问礼、行礼之命意。

与胡培翬同时代的洪颐煊亦云：“礼经莫大于宫室，宫室不明，则古人行礼之节，周旋升降，皆茫然莫知其所。”稍晚于胡、洪二人的黄式三在论《大学》之时，亦尝言曰：“道之相通，岂不可乎？曰：可也。格物不外于穷理，穷理不外于学礼。……以礼节喜怒哀乐之中，即好恶之矩也。絜矩以公好恶，所以行礼也。《大学》一篇，本礼书，以格物为礼经之实学，学不流于支离；以絜矩为礼教之成功，功不流于杂霸。”同样表达着学礼即当行礼的愿望。

至咸同时期，黄式三子黄以周闻听友人拟建精舍，曾建议以古宫室之法来构建。他认为，“世儒考古宫室制，不下十余家，率皆纸上空谈，未尝经营其事”，自己撰有《宫室通故》《明堂通故》等考礼之书，还曾“依古步筵之数缩而小之，自取紫竹构成一样”，有行礼之经验，故“较前人着实”。但无奈在营造精舍过程中，发觉不仅“所作《通故》犹有未尽”，而且“古多大木”，“今无其材”，故“最难构者，东西两梁也”，遂更悟古礼与今日之分别。

前文所述对胡培翬之说提出批评的俞樾，也曾表示“他日南中肃清，得归卧乡山，拟于南埭旧居改造先祠，即依古制为之，计所费亦不多，未知能如吾愿否”？可见，尽管复兴古礼难于实施，但并不妨碍汉学家们对行古礼的诉求。

如果探究何以诸人始终对于行礼念念不忘，其原因盖有二端。其一，从汉学的学术源流方面讲，清代汉学家多以东汉经师为重，小学尊许慎，经学

尊郑玄，而东汉是礼学特别是古礼学集大成的时期。由于河间献王在搜集古书方面的贡献，以及刘向、刘歆父子致力于恢复古礼特别是天子礼这一西汉礼学相对缺失的环节，使得行古礼的诉求得到加强。故而清代汉学家以行古礼为指归，与学尊东汉正相符合。其二，儒家对自身使命的认知促使他们不仅好古，且有强烈的回到想象中美好时代的渴望。《荀子》曰：“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正是这种使命感，使包括胡培翬在内的清儒花费巨大精力去考证古礼，从而为“美政”或者“美俗”打下基础，而一旦获得机会，即会努力尝试。

总之，胡培翬等人围绕古礼的论争，从深层次反映了清儒为学的思想实质。其治学的“境界可以说是寓思于学，要以博实的经典考证来阐释原始儒家义理的确切涵义”，在如何处理儒学中的知识传统时，往往希望最大化的“通过整理经典文献以恢复原始儒学的真面貌”。同时，清儒考据经典古制，又并非停留于知识的层面，也不是以内化为心性、信仰为指归，因为“清儒最关怀的不是个人内在道德修为的成圣境界，而是如何在经验界重整社会秩序”。他们考礼、议礼，反复进行古礼知识的考掘，为的就是能够将其外化在辅弼国政或者恤党姻里、约乡正俗等具体的实践活动之上，从而达成其“行礼”的终极诉求。

有论者认为，清代考据家将“古礼”与“俗礼”以“判然为二”的方式来处理，是受其学理的内在限制，而不得不如此的苦心孤诣。清代考据学的“道”论不仅是“精英”的，而且是“封闭”的。他们并无可能、乃至并无意愿将其“道”完全贯彻到民间所行的“礼”中，也正是因为如此，清儒所求之道既未全盘寄托在“礼”中，也终究“很难被帝王完

（下转第107页）

胡培翬：《上罗椒生学使书》，《胡培翬集》，第166页。

洪颐煊：《礼经宫室答问》，师竹山房重刊本，1884年，第1页。

黄式三：《絜矩说》，《傲居集》经说二，续刻本，1888年，第1-2页。

详黄以周：《与王某书》，《傲季杂著》文钞四，自刊本，出版年不详，第15-16页。

俞樾：《又与子高》，《春在堂尺牍》卷1，第14页。

如刘向在《五经通义》中说：“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礼乐，宣德化，教导天下之人，使为士君子，养三老，事五更，与诸侯行礼之处也。”可见他十分注重考察天子行礼之缘由与功能。见〔汉〕刘向：《五经通义》，收〔清〕马国翰辑：《玉函山房辑佚书》第三册，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2031页。另王葆玟先生注意到了两汉儒者在“士礼”、“天子礼”知识方面的差异，对于理解东汉儒者追溯古礼有所帮助。详氏著：《今古文经学新论》（增订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特别是“引论”第3-6页和第三章第111-144页。余英时：《自序》，《论戴震与章学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3-5页。张寿安：《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绪论，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第3页。

关于档案。不少学者对尹湾汉墓简牍所具有的档案学价值进行了研讨。谢桂华的《沉睡了两千余年的政府档案——〈尹湾汉墓简牍〉》(《文史知识》1998年第3期),认为尹湾简牍是我国迄今首次发现时间最早和级别最高的地方行政文书档案。朱绍侯的《〈尹湾汉墓简牍〉是东海郡非常时期的档案资料》(《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根据《尹湾汉墓简牍》所记东海郡都尉的官秩高于太守,东海郡有12个小县也设有两个县尉,东海郡的官职提升多与镇压山阳铁官苏令暴动有关及大量获流与武库储存过量兵器等反常情况,而得出《尹湾汉墓简牍》是东海郡非常时期的档案文献的结论。而卜宪群在《也谈〈尹湾汉墓简牍〉的性质》(《史学月刊》2000年第5期)中,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尹湾简牍对于西汉历史研究更多的还是资料的补充和佐证,是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张志强的《尹湾汉墓简牍档案探究》(《档案学通讯》2000年第4期),认为,尹湾汉墓东海郡文书档案一方面为汉代地方行政管理研究提供了第一手史料,同时也为研究汉代地方行政机关公文及档案管理提供了新的研究内容。岳宗福在《尹湾简牍与汉代地方文书档案》(《档案与建设》2000年第8期)中,通过分析尹湾简牍,认为西汉时期郡级地方行政文书档案主要包括四方面的内容:一是集簿(又称计簿)是汉代郡级地方政府文书档案的主体内容。二是地方吏员设置和地方长吏升迁情况是汉代郡级地方文书档案的一项重要内容。三是汉代郡级地方政府也保存军事档案。四

是文学作品及术数资料作为文书档案的补充材料,也被比较完整地收集和保存。

综上所述,尹湾汉墓简牍自出土以来,就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研究成效显著,主要表现为:研究者队伍庞大,包括老中青三代学者,特别是一些年轻的硕士、博士生的加入,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后继有人;发表了一大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论著;研究范围不断扩大,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涉及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艺术、军事学、天文历法学、图书档案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对尹湾汉墓简牍的研究中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第一,在对某些简文的释读上,尚需做精细的工作。尹湾汉墓简牍出土后,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释读,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然而对某些简文的释读仍存在着分歧,难以定论。这就需要学者们继续努力,以使释文能在最大程度上与简文原意相符合,从而为利用其开展研究的学者提供准确的材料。

第二,缺乏与其它汉简材料进行比较研究。汉代简牍除尹湾汉简外尚有居延汉简、张家山汉简、敦煌悬泉汉简、阜阳汉简等,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既可以开拓研究领域,又有助于加深对一些问题的认识。目前学界虽偶有涉及者,但成果数量偏少。

(责任编辑:陈剑)

(上接第16页)

全收编”。此说颇具启发性。然而,所谓考据汉学论道的“封闭”与“开放”,其实也与汉学学人自身的社会地位、占有的社会资源等不无关系,甚至可以说是成正比例关系。相对纯粹的汉学学人往往在“求道”方面用尽气力,而在“行道”的过程中费尽周折却又鲜见成果,于是似乎形成了“封闭”的

结局,至少是不够“开放”。胡培翬及其前后的学者断断于古礼的考证辩难,似确然建构出一个知识的“封闭圈”,但这些学人内心对“行道”的强烈渴望及对“行礼”的诉求,其实又何尝不是“开放”的呢?

详见张循:《“君子行礼,不求变俗”:清代考据学的社会性格》,《清史研究》2013年第1期。

(责任编辑:黄云鹤)